

人民军队的第一批女兵

□ 陈 升

生队”解散，“女生队”中的共产党员和一部分不愿离队回家的女兵，一部分被分配至叶挺率领的第11军第24师和贺龙率领的第20军，另一部分编入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以及第二方面军军医处等。女兵们奔赴四面八方，走上各自的革命道路。

二

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两万多人，在南昌城头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守敌3000多人，占领了南昌城。根据中央原定计划，起义军于8月3日陆续撤离南昌，南下广东。

谭勤先等11名“女生队”女兵随军从武汉乘船赴九江，与第11军政治部的的女兵周铁忠、苏同仁等会合。7月30日晚，女兵们随队冒雨翻过庐山，由狮子岭抄近路南下鄱阳湖，在星子换船，沿赣江偷渡去南昌。得知起义军去向，在接近南昌时，女兵们在军服外罩上印有红十字记号的白大褂，于李家渡上岸，步行至抚州与起义军大部队会合。

在抚州，贺龙率领的第20军中，也陆续集结起了一支女兵队伍。除了随第20军赴南昌参加起义的女兵何柏华、陈兆森等，王鸣皋、杨庆兰、孙格非等女兵，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在抚州追赶上第20军的队伍。

“女生队”解散后，女兵王鸣皋被分配到第二方面军军医处当卫生员。她随队到达九江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便下令缴械，开始在部队“清共”。王鸣皋等及时召开党员紧急会议，决定秘密出发到南昌寻找贺龙率领的第20军。他们一共10多人，其中5名女兵，于当日下午出发，辗转跋涉，于8月5日到达南昌。此时，起义军已经南下，他们随即向南追去，沿途不断打听消息，终于在抚州赶上部队，找到了第20军第1师政治部。女兵杨庆兰、孙格非等在随军校野外演习途中，得知了南昌起义的消息，经过几天急行军，也在抚州追上了起义军，加入第20军宣传队。

宣传工作是女兵们随队南下途中

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让百姓了解共产党的革命任务和政策主张，女兵们常常走上街头，通过张贴革命标语、发表演讲、自导自演文艺节目等方式，开展宣传工作。书写标语、走上街头张贴是吸引群众、开展街头宣传的好办法。女兵们在路边书写“打倒军阀”“开展土地革命”“工农革命万岁”等标语，四周便聚拢来围观的群众。标语写完了，群众也集合好了。女兵们站在凳子上，高声演讲，宣传党的土地政策，号召农民参加土地革命斗争。

为了增强宣传效果，女兵们还自编自导自演文艺节目，其中彭援华编排的《老母亲念经》备受欢迎。《老母亲念经》讲述了江西乡村的一户农家原本过着安定的生活，因受国民党军阀压迫而流离失所、生活凄惨的故事。节目反映了人民生活的现状，揭露了国民党对百姓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号召百姓行动起来开展斗争。女兵们以真实生活作为创作蓝本，用生动逼真的演出，让水深火热中的百姓产生了共鸣，引发热烈反响。

8月，正值盛夏酷暑，女兵们每日常都要随队行军走上八十九里路。经过十多天的行军，女兵们脚上都磨起了水泡，却没有一人掉队。向瑞金进军时，在王田遇到涨水，为避免与敌遭遇，部队走小路前进。这一路都是涉水前行，一走就是一天一夜。夜里涉水行走困难，女兵们滑倒在水里又相互拖扶起来，就这样一直向瑞金方面奔走。

三

起义军经过一个月的行军战斗，减员近万人。中共前委决定改道经福建长汀，再沿汀江、韩江进入东江地区。队伍向福建汀州出发时，王鸣皋等女兵留在瑞金照看伤员，王鸣皋担任护士长。在缺医少药的条件下，救护工作十分困难。有的伤员负伤失血过多，急需抢救输血；有的身上有弹片，急需开刀取出；有的需及时消炎，防止伤口腐化和感染恶化……由于条件有限，女兵们只能极尽所能为伤员们治疗，鼓励他们和伤病作斗争。待把需要住院治疗的伤员都移交汀州医院后，她们才整装出发，再

次奔赴起义军。

杨庆兰、何柏华、谭勤先等女兵跟随起义军南下到潮、梅地区，在枪林弹雨中传送命令、运送弹药，直接参与战斗。女兵们还积极动员当地群众支援起义军。在东江地区，绝大部分妇孺老人都留守在家，占当地人口的三分之二。大革命兴起后，妇女们是当地农会的主要成员。在女兵动员下，妇女们主动为部队担米、做饭、送水。战斗最为激烈时，女兵们把数百名妇女组织起来，侦察敌情、运送弹药、救护伤员，发挥了重大作用。

起义军占领潮州后，为进一步掌握敌情，革委会派胡毓秀、谭勤先和苏同仁等到邮政局、电报局收发情报。谭勤先在执行任务中负了伤，她们和部队失去联系。在医院工友的帮助下，她们三人在挂着“女厕所”牌子的房间里躲了一个星期。谭勤先伤好以后，一位医生为她们换了便服，让其充当医院的看护，照看在医院里养伤的起义军伤病员。后来，在红十字会的帮助下，她们三人离开潮州，经汕头乘船前往上海。

起义军到达潮汕后，敌众我寡，作战连连失利。女兵们根据组织安排，一部分在潮州红十字会的医院里担任护理员，后来乘船转移到上海；周开壁、曹泽芝（又名曹泽之）等女兵随队到了海陆丰地区，加入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彭援华、肖凤仪等女兵随朱德率领的起义军余部，转战于闽粤赣边界。进入赣南地区后，环境越来越艰苦，朱德派人与武汉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动员女兵到武汉做地下工作。随后，这批女兵几经周折到了武汉，走上了新的革命征途。

南昌起义军中的女兵们，是人民军队的第一批女兵。周恩来曾对女兵们说：“女将们，你们这一路表现很不錯，又勇敢又有毅力……将来革命发展了，要做的事情多得很。这一路，看得出你们女同志能够 and 男同志同样过严格的军事生活，将来也可以和男同志一样担负重要的革命工作……”南昌起义军中的女兵们用不断向困难作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对革命的一片赤诚真心，为第一支人民军队的诞生增添了新鲜力量。

（摘自2021年3月7日《解放军报》）

（上接1版）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因此，这就需要根据实践的变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继续推动新时期的理论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推进理论创新，要把握好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和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大会报告强调，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这6条体现了鲜明的人民立场、唯物辩证观点和方法论。其中，守正创新，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正，新在“从中国实际出发、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出发、从中华文明出发”说新话办新事。对这6条，我们要在学习贯彻中认真领会，从而深入贯彻党的创新理论的真理学理哲理，做到知其言更知其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贯彻落实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

牢牢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常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次大会明确提出“中心任务”，拓展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议中关于新时代“主要任务”的论断。这不仅明确了起始时间是“从现在起”，是“全面推进”而非单方面或片面，明确了复兴路径是“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份报告中不仅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重点从5个方面分析了何谓“中国特色”，还第一次提出9个方面的本质要求，第一次明确要遵循的5大原则，形成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论述，实现了理论新突破，是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比如在人均收入、预期寿命、人均受教育年限等方面都有一定标准，更有基于自己特色即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些特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概括的，彰显了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这些特色是中国道路的必然反映，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走自己的道路，必然是追求共同富裕、物质精神双丰收；这些特色源于中华悠久文明，必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大概括，不仅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强调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力量、坚持走中国道路，从经济、政治、精神等方面剖析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还彰显了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天下情怀。

在提出未来5年乃至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份报告中还强调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等原则。这5大原则，既涵盖实现现代化的领导力量、道路选择，还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立场、动力源泉和精神风貌。这些原则是一个整体，必须全面坚持和贯彻，但关键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了党的坚强领导，我们才能做到其他4个方面，才能确

保方向正确、保持昂扬斗志。

报告从经济、政治等十多个方面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行了系统设计和战略安排。其中，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教育、科技、人才是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应有之义，全面依法治国是运行轨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增进民生福祉是重要内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内在要求，国家和社会稳定是根基前提，“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是战略要求，中国共产党是关键。这些安排，体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根红线，为如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新的路线图。

牢牢把握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要求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

这就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我们党目前拥有9600多万名党员、49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大有大的样子，中国共产党致力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也有大的难处，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效卓著，同时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长期存在。要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始终得到人民信赖拥护，就必须秉持全面从严治党的精神状态，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这就要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继续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强调严格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深刻领悟“两个维护”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继续加强思想建设，坚定不移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继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狠抓作风不松劲，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继续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继续加强纪律建设，把制度的笼子扎得更加严密，坚持依规治党。

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時代要求

团结就是力量。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团结，高度重视团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通过统一战线凝聚了广泛力量，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继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一系列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继承优良传统，更加重视团结，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紧紧依靠人民，稳经济、促发展，战贫困、建小康，控疫情、抗大灾，应变局、化危机，攻克了一个个看似不可克服的难关险阻，创造了一个个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

奋斗开辟未来。无奋斗不功，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必须依靠团结奋斗。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撸起袖子加油干，一步一个脚印把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付诸行动、见之于成效。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一定能够完成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新目标新任务，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继续前进。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副主任，教授〕



不应忘却的黄埔精魂 熊雄：

□ 胡晓军 马荣瑞

中国共产党当时在军校的主要负责人。

“熊雄是兼备深厚理论功底与较强社会活动能力的军政干部，他提出的‘军事与政治打成一片，理论与实际打成一片’‘相对服从与绝对服从’‘革命生死观’等政治观念在当时影响甚广，被黄埔学员亲切地称为理论家‘熊婆婆’。”宜丰县文联原主席、熊雄研究学者辛增明说。

史料记载，在黄埔军校工作期间，熊雄制订、建立、健全了一系列政治工作制度，并亲自讲授“军校中的政治工作”等课程，聘请恽代英、萧楚女、高语罕等共产党人为政治教官，还邀请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到军校作政治讲演。同时，创办《黄埔日记》、“血花剧社”，广泛传播革命思想。培养出了一大批既能指挥作战，又会做政治工作的军事政治干部，为支援北伐战争，巩固广东后方作出了重要贡献。

“熊雄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最早从事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杰出领导人，是江西省有影响力的革命家。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江西省宜丰县史志办主任易小良说，对熊雄烈士事迹的整理研究工作最早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2012年，宜丰县熊雄研究会成立，关于烈士的研究工作开始兴起。

熊雄烈士的侄孙、宜丰县熊雄研究会秘书长熊七光坦言，以前只知道族中先辈是周恩来总理在黄埔军校时期的同事。“加入研究会后，我才知道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逐渐感受到一个革命家的初心与信仰。有这样的烈士爷爷，我很骄傲。”

1984年，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的聂荣臻元帅亲笔题词——“熊雄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摘自2018年5月3日《光明日报》）

为抗日救国捐躯的民族英雄——童长荣

□ 鲍晓菁

童长荣，1907年出生在安徽省枞阳县，14岁考入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期间，童长荣积极参加学运斗争，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踏上了革命道路。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与东京的中共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926年春成为中共日本特别支部负责人。1928年5月，日军枪杀中国军民，制造了“济南惨案”，童长荣领导爱国志士组织“中国留日各界反日出兵大同盟”，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日活动，遭到日本当局逮捕，后被驱逐出境。

1928年，童长荣回国，先后担任中共上海沪中区委书记、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等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存亡进入关键时刻，为加强对东北抗日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抽调大批骨干力量紧急赶到东北各地。童长荣等人第一批接受发展武装斗争的任务，被任命为东满特委书记。

在艰苦卓绝的东北地区抗日战争中，童长荣组织创建反日游

击队，团结各方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为东满后来的抗日奠定了良好基础。童长荣非常重视东满地区的党团组织建设，形成了县委、区委、游击大队的党委会，中队的党支部，小队的党小组等比较健全的组织机构。到1933年3月，东满地区党员人数已达到1200余人，几乎占当时东北党员总数的一半，成为东满抗日斗争的中坚力量。令人钦佩的是，1933年前后，东满特委与满洲省委有近一年时间联系几乎中断，年轻的童长荣完全凭着自己多年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政治素质、辨别能力，独立支撑着东满的抗日局面。

然而，童长荣积劳成疾，患有严重肺结核病，几次大口吐血，生命垂危。1934年3月21日，身患重病的童长荣和部队被敌人包围，他坚守在阻击敌人的一线，腹部中弹后仍继续战斗，直至牺牲，年仅27岁。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称他是为抗日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

（摘自2018年9月5日《人民日报》）